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北朝墓志的活体文献价值

刘 迪

摘 要:《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收录北朝墓志 17 品,多为新出土的墓志,时间跨度长达 48 年,是创新研究北朝中晚期历史文化与“魏碑体”书法的重要活体文献。所收元氏墓志 2 品最为珍贵:《元嶷墓志》字数长达 1389 字,是《魏书》《北史》记载的近 14 倍,可极大丰富、提升对元嶷及其相关时代、人物、事件与相互关系的全面性认识;《元世儁墓志》所记远较《魏书》《北史》为详,体现了北朝后期墓志溢美过实特征。其他如《于或墓志》《穆良墓志》《尉僧仁墓志》《和伏生墓志》等北朝胡姓墓志,对研究北朝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的历史,《张斌墓志》《王茂墓志》《尧奋墓志》等对研究北朝世族史实与文化等,均有重要的活体文献研究价值。《尧奋墓志》和《独孤华墓志》为北朝鸳鸯墓志,也有着特殊的珍稀收藏、研究价值。

关键词: 张海书法艺术馆;北朝墓志;活体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 J2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4-0158-06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经历了复杂、多元的文化融合发展历程。北朝时期由北魏孝文帝主导的汉化改革,则是顺应时代发展需要、深刻影响中国历史文化融合走向、确保中华文明得以赓续且趋于更加强盛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以北魏为代表的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确立并引领了魏晋南北朝民族文化融合主流发展方向的重要时期。

就中国书法史的发展来看,北朝时期也具有特殊意义。这一时期的楷书以刻写在石头上为主,形成了以碑刻、造像、墓志、摩崖等为代表、以方笔端峭雄健为主要特征的楷书书体,因此被称为“魏碑”或“魏碑体”。“魏碑体”是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深度融合的艺术外显形式,其总体特征是雄强劲健。它的出现,正是北魏孝文帝主导的汉化改革在文字上最为直接、鲜明的表现。而在孝文帝之后的北魏乃至北朝中后期,随着南北文化不断地交融发展,“魏碑体”的内涵也因之更加深化、丰富。

北朝时期的“魏碑体”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得到历代学者的认可。尤其自近

代康有为大力倡导、推崇“魏碑体”以来,关注、收藏和研究“魏碑体”书法作品蔚然成风。在“魏碑”的收藏和研究中,北朝墓志作为“魏碑”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之一,受到格外的关注。

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张海先生长期致力于石刻收藏,其所收藏的北朝墓志,对研究北朝历史文化特别是“魏碑体”书法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在新出版的《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中,收录北朝墓志 17 方,多为新出土的墓志,不少尚未公开面世,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与书法艺术价值的活体文献^①,不仅可以作为以纸质传世文献为主的相关研究的重要补充,而且可以拓展以其为主体、以纸质传世文献为辅的活体文献研究新领域。

一、北朝墓志与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北朝墓志述要

墓志是记载墓主姓名、生平事迹、卒葬年月等内容的一种重要随葬品,是我国丧葬习俗文化的独特

收稿日期:2023-03-09

作者简介:刘迪,女,郑州大学书法学院讲师(河南郑州 450001);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 100006)。

产物和重要内容。作为出土石刻文献的大宗,墓志存世数量众多,文字内容丰富。相较于纸质传世文献等,墓志对于考察历代社会状况、职官制度、地理建制与风俗礼制等,是更为直观、真实可靠的实物材料,久为文史学者所重视。如果同时参校与墓葬相关的其他材料和传世纸质文献材料,必能以更为活性的方式更好地证史、补史,修正纸质传世文献记载的讹误,更精准地还原、感知、探研历史真貌。

早期的瓦志、砖志初具墓志的功用,具有源头意义^②。瓦志、砖志的志文,简单标注了地名、人名、爵位等基本信息,已初具墓志的基本功能。三国至两晋时期,由于地域、审美风尚等各不相同,墓志在形制、名称、内容等方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格。东汉末年墓志已逐步摆脱碑的形制,衍生出自身的一些新特点,并向具有稳定和完备的形制发展。同时,与墓志内容的庄肃哀悼基调相适应,墓志也由汉隶演变而逐步趋向于以楷书为其基本刻写字体。

南北朝时期,墓志形成较为稳定、完备的形制,也以楷书为基本刻写字体。成熟的墓志一般为方形墓志盖与志身,称为一合,墓志盖上有篆书志额,志身镌刻志与铭,多有界格。随着墓志的发展,志文字数增多,志身尺寸变大,镌刻制作更加精美。同时,直到北魏时期尚可见到碑形墓志,此类特殊墓志的出现,体现了事物呈螺旋式发展的规律。

就北朝墓志而言,其形制处于基本趋于稳定、统一的重要阶段,志文体现出一定的规范化特征,不仅数量大、历时久,记载内容也相当丰富,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考古新发现的北朝墓志实物,使人们对墓志形制发展、字体流变等有了更为直观、切身的感受,极大地拓展、更新并提升了对墓志及其价值的认知视野。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的北朝墓志,是墓志在北朝时期形制已趋于统一、字体趋于楷书成熟阶段的实物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认知价值。

在《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中,选收北朝墓志 17 方,具体情况如下:北魏 2 方:《张斌墓志》《杨倪墓志》;东魏、西魏 10 方:《王茂墓志》《杨莹墓志》《杨兰墓志》《于彧墓志》《元嶷墓志》《元世儻墓志》《尧奋墓志》《尉僧仁墓志》《和伏生墓志》《穆良墓志》;北齐 5 方:《麴神墓志》《吴穆墓志》《独孤华墓志》《斛律武都墓志》《孙骥墓志》。在这 17 方北朝墓志中,刻写时间最早的是《张斌墓志》,刻写于北魏孝明帝元诩孝昌三年(527 年)十月,处于北魏晚期时段。最晚的是《孙骥墓志》,刻写于北齐武平六年(575 年)十一月,下距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建

立隋朝的开皇元年(581 年)仅 6 年。由此可见,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的北朝墓志,时间跨度从北魏孝明帝元诩孝昌三年到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六年,长达 48 年,大致涵盖北朝中晚期,而其馆藏多为新出土墓志,一些墓志为当代尚未公开发表过的,这对认知北朝中晚期历史文化弥足珍贵。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所收录的这 17 方北朝墓志,多为比较规范的方形楷书墓志,也有一些墓志保留了或隶楷或楷篆或楷篆隶间杂的字体风格。如《张斌墓志》《元嶷墓志》都隶楷间杂,《穆良墓志》楷书而夹杂篆体,《元世儻墓志》《孙骥墓志》楷书间夹篆隶写法等。多数墓志盖已佚,有界格。如《王茂墓志》《于彧墓志》《元世儻墓志》《尧奋墓志》《和伏生墓志》《麴神墓志》等,都属于这种情形。其纵、横长度不等,多少行随字数而定,每方之内每行的字数多相同。墓志的精美程度与墓主的身份密切相关。《张斌墓志》拓片亦被收录于《邙洛碑志三百种》中,有墓志盖。《元嶷墓志》为皇室元氏墓志,其长 88 厘米,宽 88 厘米,宏大精美,凿刻所用石质比较好,应是青石,质感似玉,整饬古朴,铭文多用典,行文古雅优美。而《杨倪墓志》因志主官职较低,墓志长 24 厘米,宽 24 厘米,刻工、书丹皆略有粗糙感,是这 17 方中唯一没有铭的。要之,《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所收藏这些墓志的形制、字体等特征,体现出北朝时期墓志形制趋于统一,字体趋于稳定、成熟,刻写以楷书为主,具有等级和质量差别等明显特征。

二、活体文献与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北朝墓志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北朝墓志所记载内容较为广泛,除了记载北朝中晚期一些重要人物与事件,还涉及包括皇室、贵族、平民在内的各阶层的其他人物与事件,反映了当时曾真实存在的个人、家族及其与之相关的社会各方面的文献信息内容。就北朝墓志来说,现遗存的皇室墓志是最具价值的墓志群,每一方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所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一书,收录了大量北魏皇家墓志,如《魏章武王妃穆氏墓志》(王妃墓志)、《魏文昭皇太后(高照容)山陵志铭并序》(皇太后墓志)等。由于皇室成员身份尊贵,他们的墓志无论在刻石材料、书丹、刻工等方面,往往都优于其他阶层人物墓志,代表了北朝庙堂级水平。墓志所记载内容,

通常涉及北朝重要人物或重要事件,价值很高。

北朝皇室墓志以元氏墓志最为珍贵,多藏于国家级机构、重要考古和收藏机构等,个人能够收藏元氏墓志极为难得。国家博物馆藏元氏墓志有3方:《元则墓志》《元宥墓志》《元羽墓志》。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北朝墓志中有元氏墓志两方:《元嶷墓志》和《元世儻墓志》。

《元嶷墓志》志主元嶷《魏书》《北史》中均有传,但两书关于元嶷传的全部文字均只有100字左右,且后者抄录前者痕迹明显。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的《元嶷墓志》字数多达1389个,几乎是《魏书》《北史》相关记载的14倍,可以大大丰富、提升对元嶷及其相关时代人物、事件和相互关系的全面性认识,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文献价值。下面试举其几个方面的价值。

第一,关于元嶷是字“仲宗”还是“子仲”的问题。《魏书》《北史》本传均作“字子仲”,《北史·卢曹传》文末校记则指出:“《北齐书》‘元嶷’作‘元仲宗’。按本书下文《高昂传》云:‘密令刺史元仲宗诱执昂。’此刺史即指冀州刺史,前后不一,遂若两人。元嶷见本书卷十五常山王遵传。但遵传说他字子仲,可能是讹误。”^[1]而《元嶷墓志》记载:“公讳嶷,字仲宗”,可据以确知《魏书》《北史》本传中“字子仲”记载有误,《北齐书》和《北史·高昂传》所记“仲宗”是正确的。

第二,对元嶷家族谱系认知的价值。《元嶷墓志》记载:“公讳嶷,字仲宗,河南洛阳人也,常山康王之曾孙,河间简公之孙,光州敬公之子。”对照纸质传世文献,《魏书·常山王遵传》《北史·常山王遵传》等都有关于元嶷家族谱系的简要介绍。根据《魏书》《北史》的记载,元嶷家族出于北魏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这一支,北魏开国皇帝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即为拓跋什翼犍的嫡孙,道武帝拓跋珪即位后尊他为北魏高祖^③。

拓跋遵为昭成帝之子拓跋寿鸠的儿子、道武帝拓跋珪的堂兄,被道武帝封为常山王。常山王拓跋遵之子拓跋素“世祖初,复袭爵”^{[2]435}。北魏世祖即太武帝拓跋焘,可知拓跋素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常山王爵位,而他去世后,“谥曰康”^{[2]435}。由此可知,《元嶷墓志》称元嶷为“常山康王之曾孙”,正是将元嶷曾祖父拓跋素的常山王爵位和他死后的谥号予以合称。

《元嶷墓志》称元嶷祖父为河间简公,《魏书·常山王遵传》《北史·常山王遵传》等记载的拓跋素

之子有4位:拓跋可悉陵、拓跋陪斤、拓跋忠、拓跋德。长子拓跋可悉陵死于凉州征战,拓跋陪斤袭爵常山王,因犯罪而受到“除国”惩罚^{[2]436}。其弟拓跋忠赐爵城阳公、谥曰宣,其弟拓跋德赐爵河间公^{[2]437}。《元嶷墓志》称元嶷祖父为河间简公,史载拓跋素之子中只有拓跋德赐爵河间公,而《魏书》《北史》均记载拓跋德之子元悝卒于光州刺史^{[2]438},《元嶷墓志》称元嶷为光州敬公之子,由此可知河间公拓跋德为元嶷祖父。修订本《魏书》于拓跋德死后被赠曹州刺史注中考论:“‘曹州’疑为‘冀州’之讹。按北魏不见曹州,永平四年《元倓墓志》称‘祖平南将军、冀州刺史、河间简公讳于德’,‘于德’此传单称‘德’,其‘冀州刺史’当即赠官。”^{[2]449}《元嶷墓志》所称“河间简公”之“简”不见于《魏书》《北史》记载,但从《元倓墓志》“河间简公”可知,“河间简公”当为爵位与谥号的合称,“简”为拓跋德的谥号。爵位的地名少见“涧”字类用词,“河涧”之“涧”疑当作“间”,当以“河间”为正。

《魏书》《北史》均记载拓跋德之子元悝卒于光州刺史,谥曰“恭”^[23],而《元嶷墓志》称元嶷为光州敬公之子。“恭”“敬”意义相近,本谥当为“敬”,后史家因避讳而改为“恭”。

第三,关于元嶷生卒年的问题。元嶷的出生时间《魏书》《北史》和《元嶷墓志》均无记载,其去世的时间,《魏书》《北史》均仅记“薨于瀛洲刺史”,《元嶷墓志》则明确记载元嶷“以兴和年二年十月廿一日薨于位,春秋六十有二”。兴和为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的年号,兴和二年即540年,由元嶷享年62岁,可以推知他出生的确切时间为孝文帝太和三年,即479年。

第四,关于元嶷的生平仕履问题。《魏书》《北史》对元嶷的生平履历的记载均较为简略,《魏书》记载元嶷“孝武初,授兖州刺史”,“封濮阳县伯”,“孝静时转尚书令,摄选部”,“薨于瀛洲刺史,赠司徒公,谥曰靖懿”^{[2]438}。《元嶷墓志》的记载则可谓详尽,其称元嶷“释褐侍御史,转直阁将军,又除征虏将军、燕州刺史”,“征拜平西将军,西中郎将,转卫尉卿”,“寻授使持节都督,西兖州诸军事抚军将军,兖州刺史”,“仍拜使持节都督、冀州诸军事本将军、冀州刺史”,“除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领军将军。太昌初,拜使持节都督,兖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将军,仪同如故”,“加骠骑大将军,开府。又论佐命之勋,封濮阳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迁尚书右仆射,转左仆射仪形庶尹,师长具僚”,“天平元季,除领军

将军,转尚书令,摄吏部选”,“除使持节都督,瀛洲诸军事,瀛洲刺史,仪同开府如故”,“诏赠使持节都督青冀齐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青州刺史,录尚书司从公”。

第五,关于元嶷的具体事迹和评价。《魏书》《北史》仅记载了他在兖州刺史任上“弃城出走”这样一条负面性事迹:“于时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谋逆。弃城出走,悬门发断,嶷要而出。诏齐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隽各部在州士往讨之。嶷返,复任。”本传对他的评价也颇负面:“嶷虽居重任,随时而已。”墓志则全面记载了他早慧成才、孝友清峻德操、智勇领军、仁声治民的非凡才干与功业,多歌功颂德之词。墓志文采斐然,颇富有文学色彩,与史传的平实简述风格颇为不同。

综上所述,《元嶷墓志》不仅可与史籍互证,而且大大丰富了史籍所未记载的历史史实。关于元嶷生平记载所折射的从北魏孝文帝时代直到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兴和二年的60余年政治风云,尤其是其中对与高欢的交游、北魏分裂等史实的记载,更是十分珍贵的历史史料。《元嶷墓志》确是一方极具史料价值的墓志。

《元世儻墓志》的志主元世儻《魏书》《北史》均有传,记载元世儻曾祖为太武帝拓跋焘长子景穆皇帝拓跋晃(即北魏太武帝太子拓跋晃,其子文成帝即位后追尊为帝),祖父为任城王拓跋云,父亲为第二任任城王元澄之弟元嵩,元世儻为其第二子^[2]⁵³¹⁵⁵⁹。《元世儻墓志》记载曾祖恭宗景穆皇帝,祖司徒康王,考领军高平刚侯,其对祖上名讳和职官的叙述较《魏书》《北史》为简,不过,《魏书》《北史》正记任城王云死后“谥曰康”,而元嵩高祖孝文帝南伐战争中“以功赐爵高平县侯”,死后“赠车骑将军、领军、谥曰刚侯”,都与墓志相合,墓志对其父元嵩的记载統合了其爵位、职衔和谥号,所记职官、生平事迹内容远比史载详细。与史传以“颇有才干,而无行业”的善恶兼写、侧重记载他的重大过失笔法不同,墓志多夸写其所谓武功文德,有主观溢美之词,体现了北朝后期墓志多溢美过实的特征。墓志记载他“春秋卅七,以兴和二年九月,薨于晋阳之公邸”,如前所说,兴和为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的年号,兴和二年即540年,由元嶷享年四十七岁,就可推知他出生的确切年代为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即494年,这些内容是对史载缺失内容的重要补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于彧墓志》《穆良墓志》《尉僧仁墓志》《和伏

生墓志》等属于“勋臣八姓”“四方诸姓”“内入诸姓”^④中的胡姓,对研究北朝胡姓与相关历史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世族墓志如《张斌墓志》《王茂墓志》《尧奋墓志》等,对研究世族等相关史实与文化有重要参考价值。《王茂墓志》载:“母略阳吕氏,妻博陵崔氏。”吕氏与崔氏皆为世族大姓。《张斌墓志》中载:“丞相高阳王可谓琼台锦萼,贵同辰极,迺付款卯年,绸缪早岁。玉剑互传,轻裘递服,或接袖柏堂,或清谈廊庙。及闻君薨,王变貌恻容,潸然增涕。”这段文字描述了张斌与高阳王的交游,彰显了墓主身份。这里的丞相高阳王指的是孝文帝之弟王雍,高阳王《魏书》有传。《魏书》载:“肃宗加元服,雍兼太保,与兼太尉崔光摄行冠礼。诏雍乘车出入大司马门,进位丞相。”^[3]可见高阳王于肃宗元诰正光元年(公元520年)“进位丞相”,时间与此墓志相符合,有证史之功用。志主张斌字博文,凉州敦煌人,是敦煌世族,出仕北魏朝廷,受到宣武帝的器重,在洛阳朝廷历任太仆少卿等要职。此志是丝绸之路敦煌大族与北魏政权密切协作的石刻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杨倪墓志》可算作民间墓志,志主官位低,多有讹误,有过度溢美夸耀祖先之嫌,史料价值略低。

值得一提的是,《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中还有一对北朝鸳鸯墓志,为《尧奋墓志》和《独孤华墓志》,可谓异常珍贵。民国时于右任先生遍寻汉至宋的墓志(主要为北朝墓志),才找到7对夫妻墓志,他将其斋号命名为“鸳鸯七志斋”,可见鸳鸯墓志的罕见与重要价值。尧奋在《北齐书》中有传,墓志与《北齐书》记载高度吻合,此墓志真实性强,史料价值很高。《独孤华墓志》也为研究独孤氏家族文化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活体文献与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北朝墓志的书学研究价值

北朝书法字体经历了从篆隶逐步向楷书转化的完整过程,在北魏时期已基本完成楷化进程,形成以“洛阳体”为典型代表的“魏碑体”,由此而奠定了隋唐成熟楷书的基础。“魏碑体”的总体特征是雄强劲健,它是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深度融合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石刻书法在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形态。在北朝中后期,随着南北文化的不断交融,“魏碑体”的内涵也因之更加深化、丰富。《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所收17

方北朝墓志,时间跨度基本涵盖北魏中晚期,不仅是研究北朝历史文化与“魏碑体”书法的重要实物见证,也体现了北朝中后期的字迹演变特征,可以让人们更直观、全面地认知北朝中后期乃至北朝整体书风的流变。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的《张斌墓志》和《杨倪墓志》是这方面的代表。《张斌墓志》墓主任太仆少卿,其秩为第四品上^[4]。张斌的身份非皇族,在朝廷出任要职,其书法应该具有时代的普遍性特点。《张斌墓志》的书法已经不再是笔端方劲的典型“魏碑体”风格,虽然一些笔画还保留方笔,但多数已用圆笔取代之,相比于北魏早期的雄强刚劲,变得更加灵动流转,刻写俱佳,整体上显得整饬典雅、古朴饱满,其中一些字已经与成熟唐楷近似。《杨倪墓志》错误较多,从一些字可明显看出镌刻之草率、粗糙,一些刀痕方笔也是由于镌刻随意造成的,此墓志依然有别于北魏早期字迹以方笔为主的特征,有很多圆笔。可能因为杨倪身份平平,墓志刻工等都略显粗糙草率,甚至出现笔画漏刻的现象。但如果单论其书法,此墓志书风古拙朴质,有意趣,虽不算上乘之作,亦有其重要艺术价值。

这两方墓志既是体现北魏书风流变的作品,也是南北文化与书风进一步交融的产物。由此可见,形成于北魏时期的“魏碑体”不全是方劲雄强的。北魏晚期,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有很多墓志在保留古朴刚劲风格的同时,进一步吸收南方的流美典雅,开唐代欧阳询、虞世南书体之先河。《张斌墓志》和《杨倪墓志》是其中的两例,丰富了“魏碑体”的风貌与内涵。

综观《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中的10方东魏、西魏墓志,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一是用笔方圆兼备,圆笔越来越多;二是多杂用篆隶别字,以求高古之风。此阶段墓志的刻工似比北朝早期精进,更加注重刻工与书丹的关系,使得墓志书法更能凸显出书丹原貌,有书写之意。北朝方笔的出现,与凿刻工具有必然联系,这导致北朝石刻书法有一定程序化、装饰化的倾向,当凿刻更接近于书丹面貌,再加上南方文化的影响不断加深,圆笔的增多就不足为怪,书写变化增多使得整体风格更加生动有趣。《王茂墓志》《于彧墓志》《元嶷墓志》《尧奋墓志》等,皆圆笔较多,楷书风味十足,具有书写感。镌刻于东魏元象元年(公元538年)的《于彧墓志》,刻工忠于书丹,圆笔居多,行笔还略有一些隶书写法,主要是捺画等,但整体笔画特征已是楷书风貌,结体方

正,典雅灵巧。此墓志除了能够显示出楷书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其本身书法价值亦高。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的北朝墓志《于彧墓志》《元世儻墓志》《尧奋墓志》等,墓志文中杂用篆隶别字,可能是希望墓志更彰显高古之风味,体现出典型的北朝末期墓志的风尚。这一时期的墓志风格继续向南方靠近,进一步完成楷化,为隋唐楷书之先声。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的5方北齐墓志,证实了北朝末期隶书复兴的趋势。《獬神墓志》已经有了一些笔画为隶书写法,尚不明显。《吴穆墓志》字体长方,隶意明显。《独孤华墓志》虽然楷意十足,但用笔多隶书笔法。《独孤华墓志》与《尧奋墓志》这对鸳鸯墓志都用圆笔较多,凿刻忠于书丹,镌刻精细,很好地传达了书丹笔意,书写性十足。《尧奋墓志》相较《独孤华墓志》更加古雅正健,具有时代典型特征,夹杂篆隶写法。《独孤华墓志》明显体现出隶书写法,但其与汉隶以及北魏早期尚未脱去隶意的魏体楷书具有一定区别,该墓志结体方正,楷意更甚。《孙骥墓志》字体多楷书,夹杂篆隶,一些笔画为隶书写法。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收录的北朝墓志有着很高的书法价值。《王茂墓志》的书法可以称得上是“魏碑体”中的上品之作。其方圆兼备,刻写俱佳,结体内紧外疏,用笔娴熟沉着,精巧筋劲,典雅中有着飘逸灵动,每一个字似乎沉静又似乎跳跃着,此书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楷书,但隶意尚存,古雅明媚。整篇留有较大空间,疏朗有节奏感,让人联想到平静海面上的粼粼波光,灵动而美好。《尧奋墓志》的结体、布局耐人寻味,结体宽博方正,笔势略外扩,整体空间有秩舒服雅致,笔力饱满峻健,圆笔、点画、弯折线条增加了作品的灵动性,尚未完全脱去的隶书笔意增加了古雅之意,十分有趣,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北朝墓志丰富了“魏碑体”的面貌,使得“魏碑体”的概念更加立体、丰满,对于全面研究北朝书法书迹演变、书法风格等具有重要价值。由于墓志相比于碑刻等石刻长期埋于地下,保存完好,新出土的墓志宛如新刻,与拓片以及长期风化的原石不可同日而语。“魏碑体”的形成,是刻与写双重创作产生的艺术风格。张海书法艺术馆收藏有墓志原石,可以让研究者清晰观察刻与写的关系,完整地看到每一个笔触,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了近距离观看古人书法作品原貌的机会。

结 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出土文献呈现爆炸性态势,特别是墓志以惊人的速度涌现,出现了大批堪称活体文献的新材料,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空间。但是,研究者多面临相似的问题,多数个人收藏难得一见;部分博物馆收藏不对外开放,即使开放也很难进行长时间细致观察;拓片质量不等、真假难辨,这促成了关于文献的图录整理出版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地方收藏机构以及考古机构、个人收藏的很多整理图版的图册面世,如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国家图书馆编《铭刻撷萃: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金石拓片图录》,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李献奇、郭引强编著《洛阳新获墓志》,洛阳市文物局编《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杨作龙、赵水森等编著《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等。个人收藏也不断出版,赵力光主编的《鸳鸯七志斋藏石》就是对于右任所藏石拓本的整理出版。这些大型集编,为我国墓志石刻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但多数图录是考古或其他领域专家编著,考古工作者出版图录的目的主要是为显示墓志信息。另外,由于图版成本较高,有一些尺寸较大的墓志,为了节约成本,不得不

缩小版面,放置比例很小,这些都给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与其他研究相比,研究书法、书学更需要清晰的图版。

张海先生热心于文物保护与收藏,一直致力于收藏散落的墓志。张海书法艺术馆收藏的北朝墓志乃至其他朝代的墓志都具有重要价值,现在他将所藏的新出土墓志材料结集出版,可谓功在千秋。此次新出版《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努力让图片尽可能清晰,对魏碑书法研究和临池有重要价值。这将为墓志研究拓展出以墓志为主体、以纸质传世文献为辅的活体文献研究新领域。

注释

①刘志伟提出活体文献概念,他指出:“活体文献”针对以纸质传世文献为主的传统研究模式而提出,具有活性、复活、再生、共生、共诸意义。②关于墓志的起源问题,学界观点分歧,有“西汉说”“东汉说”“魏晋说”“南朝说”“秦代说”等,参见赵超:《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李学勤《也谈邹城张庄的砖文》一文认为墓志起源于战国时期。其他学者如华人德则认为墓志起源于周代“明旌”。③北魏孝文帝死后庙号为“高祖”,不可与道武帝拓跋珪即位后尊拓跋什翼犍为北魏高祖混为一谈。④具体论述详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

参考文献

- [1]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155.
- [2] 魏书[M]//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8.
- [3]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556.
- [4] 俞鹿年.北魏职官制度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77.

The Living Literature Value of the Epitaphs of the Northern Dynasty in Zhang Hai Calligraphy Art Museum

Liu Di

Abstract: The 17 epitaphs of the Northern Dynasty included in the *Collection of Stone Carvings of Zhang Hai Calligraphy Art Museum* were mostly newly unearthed. The time spanned 48 year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living document for innovativ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middle and late Northern Dynasty and the calligraphy of the “Wei Stele”. The two Yuan’s epitaphs collected are the most precious; the number of words in the *Yuan Ni Epitaph* is as long as 1,389 words, which is nearly 14 times that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Wei* and the *Northern History*, which can greatly enrich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Yuan Ni and his related times, characters, event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The epitaph of the Yuan Dynasty* is much more detailed than the *Book of Wei* and the *Northern History*, and also reflects the epitaphs in the late Northern Dynasty were always over-beautified. Other epitaphs surnamed Hu in the Northern Dynasty, such as *Yu Yu’s Epitaph*, *Mu Liang’s Epitaph*, *Wei Sengren’s Epitaph*, and *He Fusheng’s Epitaph*, have important living literature research value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ep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Han people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so do *Zhang Bin’s Epitaph*, *Wang Mao’s Epitaph*, *Yao Fen’s Epitaph*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noble families and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Dynasty. *Yao Fen’s Epitaph* and *Dugu Hua’s Epitaph* are the coupling epitaphs of the Northern Dynasty, and they also have special rare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value.

Key words: Zhang Hai Calligraphy Art Museum; epitaphs of the Northern Dynasty; living literature; value

责任编辑:绿 叶